玉洱银苍俊万里 白山黑水任奔流

——纪念周保中同志诞辰120周年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今年2月7日，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杰出领导人周保中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缅怀周保中同志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中作出的积极贡献，弘扬其精神风范和品格特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做到心中有信仰、前进有方向、脚下有力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驰骋北伐疆场 矢志不渝心向党

周保中原名奚李元，字绍黄，1902年2月7日出生于大理市湾桥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7年2月，抱着富国强兵的愿望，周保中加入云南陆军第一师教导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南征北战。1923年，周保中被选送进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学习军事。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阅读了《新青年》《新潮》等大量进步报刊，在昆明组织“大理旅省学生会”并担任主席，积极开展爱国运动。

1926年，周保中在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在这里，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社会进化简史》等著作，认识到“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可能造成大的形势”，找到了革命领路人——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他参加北伐战争，随军转战湘、鄂、赣等省，英勇作战、屡立战功，逐步成长为一名骁勇善战的指挥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在大革命紧急关头，周保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毫不犹疑的站到革命战线上，勇往直前的对着目标走”。

1928年底，党中央安排周保中赴苏联学习，他如饥似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科学，积极参加党团工作，并旗帜鲜明地与王明宗派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甚至被开除党籍。但周保中同志始终坚持对党的忠诚，错误的处理意见最终被撤销，党籍得到恢复。

转战白山黑水 抗日救国信念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沦陷，成为抗日救亡运动最艰苦、最残酷的地方。1932年初，根据党中央的安排，周保中胸怀“何日尽除倭寇去，佩剑铿锵渡瀛洲”的壮志，不怕环境险恶和条件艰苦，毫不犹豫奔赴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艰苦也最壮烈的革命历程。

周保中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时，提出了党必须发动群众，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并在党的领导下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正确主张。同时，为争取和领导自卫军、救国军等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周保中做了大量的争取和团结工作。1934年2月，宁安反日同盟军办事处成立，后改为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并建立同盟军党委和军事委员会，周保中兼任党委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一支党直接领导下的坚强的抗日队伍正式成立并不断发展壮大。同盟军结合东北抗战形势，机动灵活地调整战略战术，有效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牵制了大量日伪军。

1935年2月，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兼军党委书记。1936年2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周保中仍担任军长兼军党委书记。这支队伍成为党领导下的东北地区抗日部队中的重要武装力量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同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成立，周保中任总指挥，下辖抗联第四、五、七、八、十军和姚振山东北义勇军、王荫武救世军。第二路军灵活机动、英勇奋战，活动范围扩展到包括乌苏里江左岸，沿松花江和松花江流域20余个县，同以杨靖宇同志为首的南满抗日联军和以赵尚志同志为首的北满抗日联军形成“品”字之势，互为依托，东北抗日联军空前壮大。

1938年前后，日本侵略者对三江地区的抗联部队进行了持续疯狂的“大讨伐”。为粉碎敌人企图把抗联部队“聚而歼之”的阴谋，开辟新的游击区域，周保中同志组织东北抗联第二路军主力西征，自己率第二路军总部及留守部队猛烈开展游击活动，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日本侵略者视周保中为眼中钉、肉中刺，悬赏拿下他的首级由1万元增至10万元，后来甚至提出用他的一两肉换一两黄金。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周保中始终对党忠诚、信念坚定，坚持与敌人浴血奋战。周保中同志是云南人，但在东北漫长的冬季，他经常带领队伍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行军作战，过着“弹尽战到底，粮绝忍饥饿”的艰苦游击战争生活。1940年，在抗联部队遭受严重挫折、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继续组织开展小分队游击活动。1942年8月，周保中任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坚定不移率部继续坚持战斗。1945年8月率部配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周保中同志治军有方，他十分注意运用毛泽东建军思想建设部队。早在抗联第五军初创时期，他就在部队内积极发展党团员，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把支部建在连上，使部队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他非常重视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和组织宣传工作，为了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他编写了《政治学常识》《社会学常识》等材料，组织学习《新华日报》《救国时报》等，同时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对抗联将士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坚定抗敌信心。他英勇顽强，冲锋在前，率先垂范，用模范行动影响和教育抗联将士。周保中同志曾先后五次负伤，其中三次是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在一次战斗中，他腹部被子弹打穿，肠子流了出来，他忍痛把肠子塞进伤口继续坚持战斗，在场的抗联将士深受感动。在周保中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下，抗联队伍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转战在白山黑水之间，顽强地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先后谱写出“莲花泡四十二烈士”“十二烈士山战斗”“八女投江”等可歌可泣的诗篇。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保中同志回到东北，为我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1946年4月，时任吉林省政府主席、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吉辽军区司令员的周保中同志，被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将，担任长春争夺战的总指挥，指挥部队击溃由伪军、警、宪、特、土匪组成的反动武装2万余人，于4月18日攻占长春，为我军攻打大城市提供了宝贵的作战经验。同时，周保中在东北战场上发挥了对滇军工作的特殊作用。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周保中指挥部队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800多次战斗，歼敌4万余人，同时还为主力部队输送近19万人，有力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

情系云岭大地 一片丹心报桑梓

1950年2月，根据党中央决定，周保中同志回到阔别25年的故乡云南，历任云南省委委员兼省委统战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主持解放初期全省的军事接管和省人民政府的日常工作。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民族众多，解放初期敌我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形势错综复杂。周保中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云南“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十分关心民族团结事业，并以一名久经考验和磨砺的少数民族干部的特殊身份，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他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在我们云南，没有各兄弟民族友爱合作，就没有很好的生产建设，更没有边境国防。”他直接领导全省民族工作，大力疏通民族关系，领导创办了云南民族学院，培养民族干部，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对促进当时全省的安定和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保中在云南工作近三年，在领导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建立各级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竭智尽忠，呕心沥血，为云南解放初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11月，周保中调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任兼民政部部长。1954年后，周保中当选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长期艰苦的游击战争生活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夜以继日的劳累，摧垮了周保中的身体。1964年2月22日，周保中同志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享年62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纪念周保中同志，重温他光辉的一生，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宝贵精神和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强不息，自觉从我做起，把个人理想融入谱写好中国梦云南篇章的奋斗中，把心血和汗水、拼搏和奉献印刻在云岭发展的大地上，坚定理想信念，弘扬革命精神，夙夜在公、担当实干，为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而努力奋斗！

清风起云岭 美名传千古

云南古代清官廉吏

鬻琴知县孙士寅：勤廉爱民烛照古今

陈聪明

距离富源县城8公里的“胜境关”，是云南著名历史文化景观。在胜境关清风亭内，矗立着一块“鬻琴碑”，碑额上镌刻着梅花和兰花，寓意纯洁高雅、坚韧不拔。这块石碑记载着清代康熙年间平彝（今富源）知县孙士寅勤廉爱民的动人故事。

据康熙《钱塘县志》和光绪《平彝县志》载，孙士寅，字羲宾，出生于浙江杭州府钱塘县的书香门第，自幼喜好弹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考中举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孙士寅携带一张心爱的古琴出任云南平彝知县。

史料记载，孙士寅刚上任几个月，县城遭遇了洪灾。孙士寅身先士卒冲在一线，带领民众抢险救灾。洪水过后，孙士寅实地走访查看平彝县城地形地貌，带领民众兴修防洪水渠，复垦复耕农田，恢复生产生活。当时匪患突出，孙士寅斗智斗勇，惩恶除霸，社会环境由“乱”而“治”。

三年任职期满，朝廷知悉孙士寅治理有方，决定提拔他回江南任职，平彝百姓竭力挽留。于是朝廷顺应民意，让其连任三年。6年任职期间，孙士寅兴水利、垦农田、办教育、除匪患、严吏治，循绩惠政，不可殚记。清廉爱民的孙士寅任满离开富源时，囊空如洗，连路费都无法凑齐。百姓感其恩德，自发捐助，孙士寅却一一谢绝，分毫不取。最终，孙士寅把上任时带来的古琴卖了充当路费。别离当日，百姓依依不舍，十里相送。为颂其清廉、念其德泽，当地百姓刊石树立了“鬻琴碑”。

光绪末年，平彝拔贡李恩光闻此事迹，深情写下《鬻琴碑记》：“来携此琴来，去鬻此琴去……三年课绩循良吏，百姓见肥使君瘦……磋磋一碑何足异，去思德政塞天地。争似史笔照空山，刻划龚黄无多字……呜呼！贪夫读此当汗颜。”《鬻琴碑记》只有200余字，是对孙士寅履职平彝6年政绩政声的高度浓缩和总结褒扬。

在“爱民”中践行“为民”。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孙士寅赴任平彝县时，面对的是经济萧条惨淡，治安积患重重。不畏千里迢迢从浙江钱塘富庶之地前来赴任的孙士寅，内心顿时充满了挫败感。然而，沮丧失望之后，是守着知县的位置浑浑噩噩当一任“太平官”，敷衍塞责，期满走人，还是迎难而上勤政为民勇做“拓荒牛”，耕耘出一片新天地？孙士寅毅然决然选择了后者，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执着与韧劲，深入实际，急民之所急，谋民之所谋，勤抓农业生产，整饬治安乱象，筹钱兴办教育。短短6年励精图治，“百姓见肥使君瘦”，孙士寅把亲民爱民的从政理念融入工作实践，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了平彝百姓的幸福指数。

富源胜境关清风亭

在“无我”中书写“大我”。孙士寅任平彝知县6年，卸任返乡路费竟是变卖心爱的古琴所得。在今天看来，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堂堂一个知县，何至于如此穷困潦倒？原来，孙士寅任职期间，心无旁骛扑在治理繁忙公务中，或升堂问案，定纷止争；或涉足乡野，体恤民情；或走访商铺，洞察行市，他在乎的全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丝毫没有谋取个人利益。在孙士寅心里，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就是自己最大的成就和“利益”。就连朝廷发的俸禄，孙士寅也常常拿来救济穷苦百姓，毫不吝啬。正所谓来时一身风尘仆仆，去日两袖清风盈盈。孙士寅将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履职尽责上，心里装的全是老百姓的安危冷暖，他以一心为公的“无我”精神，书写了造福百姓的“大我”。

在“清心”中恪守“清廉”。清代民间有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大意是即使政声清廉的官员，三年下来，也要捞成千上万两银子，贪官就更不用说了。而孙士寅任平彝知县6年，竟然没有路费返乡，这与当时官场形成强烈对比和反差，贪与廉，既是对职业操守的一种拷问，也是对两条截然不同人生道路的一种选择。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原路南彝族自治县）有一块“遗臭碑”，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路南县长许良安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劣迹。“鬻琴碑”与“遗臭碑”，一“香”一“臭”，历史与人民的评价也一正一反，发人深省。孙士寅秉持公心，保持廉洁，清而有为，一心为民，不谋私利，注定流芳百世。当前，富源县充分挖掘孙士寅勤廉文化资源，启动孙士寅廉政主题公园建设，让干部群众身临其境接受清廉文化熏陶，营造人人爱廉、知廉、守廉的良好社会氛围。

悠悠岁月，雄关难见当年势；漫漫长河，千帆驶过万木春。孙士寅长已矣，但其勤廉爱民的风骨却烛照古今。登上胜境关城楼远眺，“当年鬻琴人犹在，古驿道上有哭声”的送别情景仿佛仍在眼前。驻足“鬻琴碑”前，抚今追昔，孙士寅一片丹心、忠诚为民的感人事迹足以镜鉴古今、启迪当代。

（作者单位：富源县纪委监委）

本版主编：云南日报理论评论部
投稿邮箱：ynrb-llb@yndaily.com yn001@139.com
联系电话：0871-64162931 64195021
阅读理论文章请扫码进入云南理论网

洁己奉公的刘世馔

“宁黜吾官，不虐吾民以奉上”

李江

呈贡魁阁今貌

昆明市呈贡区城南外有座万寿寺，当地人称大佛寺。过去寺内有两株古柏，终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树冠迫近云霄。清代康熙年间，呈贡知县刘世馔常游此地，并写下《万寿寺古柏》诗：“双柏何年植，婆娑迥出尘。青青色不改，阅尽古今人。”从刘世馔的为官做人来看，这首颇有内涵的五言绝句，实际是他的“言志”之诗。

刘世馔，河南新蔡人，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己未科进士。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任云南呈贡知县。到任后，他决心为地方多做好事，明确表示：“宁黜吾官，不虐吾民以奉上。”《康熙呈贡县志》记载，刘世馔“赋性耿介，洁己爱民，慨然以兴利除害为己责”。文献资料表明，刘世馔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刘世馔上任以后，对区域内河水源流、分布、走向以及各村用水与灌溉田亩情况，都“亲临其地，逐村验看”，深入调查研究，做到熟悉县情、村情。他认为水利是农民的命脉，对农民来说“一滴水不啻一粒珍珠”。在他治理下，通过合理利用水源，合理分配农业用水，使农忙季节农民为分水争斗的情况减少。在与邻县分水之争上，刘世馔也向上司陈述道：“各县有各县的界址，各村有各村的分水。有的地方不疏通本境之旧渠，而乃肆意欺罔翼邻封之微利，贪心无厌、刁风断不可长。”他提出了分水意见，既解决了呈贡因灌溉不足而引发的各村分水之争，也维护了呈贡农民的合法权利，使得他在呈贡民众中威信倍增。

刘世馔主张减轻农民负担，向上级请求免去向远方运送积谷。他分析了积谷外运加重农民负担的状况，认为“各处积谷，原为各地方旱涝而备”，如果以此处的积谷运抵彼处，那么农民就会埋怨说：“我岁岁输之，则不得升合食之，是彼为赤子，而我为膜外也。”他认为，农事稍闲，就让农民去碓碾积谷，还要他们运粮米到外地去，“舍其终岁之计而趋诸碓碾之间，触目惊心，亦有所不忍也”。刘世馔希望上司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不要让他们长途跋涉，运送积谷，以减免其劳役之苦。

刘世馔在任时，十分注重培养人才，兴办教育事业。呈贡《新建魁阁碑记》记载了刘世馔修建魁阁、肄业所，培养人才的情况。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他“政初就理、农务隙矣”，即“就前人未尽之功”修建魁阁，还“建谈六经处、筑肄业所，技童生之俊者实其中，延师训之。”魁阁及肄业所建成后，适逢石屏州知州刘启承以同乡、族弟之身份来访，刘启承欣然题写匾额“龙翔书院”于其间。刘世馔对上述教育设施甚为满意，并亲撰碑文、勒石以纪念。据清光绪《呈贡县志》记载，当时人们对刘世馔重视教育及其成效给予很高评价：“即今科第连锦，皆其遗泽也。”

刘世馔任职期间，有一年，昆明、呈贡一带旱情严重，连续10个月未下雨，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撰写了《祈雨告文》及《告山川文》：“一苗未插、一种未下，室家嗟叹、道路愁苦，神知之否？”其爱民的思想溢于言表。他切望上天赐甘霖，企盼“天上之金蛇何时布雨，望台边之玉女甚日披衣。”在旱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刘知县“痛切怀中”，并与老百姓同甘共苦，抵御灾害，深受百姓爱戴。

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后，刘世馔由于政绩突出，得到朝廷的重用，擢升为户部江南主事。他正准备“治装就道”，但由于多年来劳累奔波、积劳成疾，病卒于呈贡任所。他临终时对守候在身边的人嘱咐后事，只谈及县里民事，却未提及家务事。刘世馔忧心民事、洁己奉公，使得呈贡民众深为感动。呈贡县志把刘世馔列入名宦之列，当时呈贡民众还把他奉为神佑，以“城隍祀之”，让他享受四时香火。

在历史长河中，有一些官员清正廉洁，勤勤恳恳，即使官阶不是很高，但是为了百姓的幸福和生活，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刘世馔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能够忘却小我、体恤百姓疾苦，常自称：宁黜我官、不虐我民，体现了不畏权贵、以民为本、敢于担当的可贵品质，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作者单位：昆明市呈贡区纪委监委
图片摄影：耿嘉）

云南省纪检监察学会
云南日报 联办
云南廉政研究中心